

第 一 编

儒 家 智 谋

儒家智谋概论

如果说道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聪明的一页，法家智谋是其中最刻毒的一页，兵家智谋是其中最冷峻的一页，纵横家智谋是其中最无耻的一页，阴阳家智谋是其中最神秘的一页，那么，儒家智谋就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至为深刻的一页，是真正的大智谋。

关于儒家的大智谋，因为与儒家的王道理想相联系，所以是一个非常深奥复杂的问题，但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只是选取其智谋性的一面，即王道理想是如何转化为智谋和儒家智谋仁术治国的特点。

孔子曾经说过：“听讼，吾犹人，但使无讼。”意思是说，处理诉讼案件，我和一般的人一样，也要按照法律办事；但我和一般的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要首先实行礼乐教化，从根本上杜绝诉讼案件的发生。这是孔子以礼乐治国思想的基本表述，如果能和司马迁的另一句话相参照，就会对孔子的这段话有更深刻的认识。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这就是说，礼乐教化对于治国治民来讲是更根本的，而法律往往只是起个“马后炮”的作用。

总的说来，中国有关治国治民的智谋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治标和治本。显然，儒家是“治本”的代表学派，而法家是治标的代表学派。

儒家自身似乎是反对在治国治民上使用智谋的，起码没有公开提倡过，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文化的智谋型的整体特点中，儒

家思想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智谋，它的各个方面都在智谋文化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

简要地说，儒家的王道理想所考虑的不是个体的人的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王道理想是要首先指向社会的利益的，但社会的利益又必须是牺牲个体的人的利益换来的。这样一来，在王道理想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个体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利害关系。因此，儒家的王道理想在考虑具体的策略时必然地要想方设法地趋利避害，实际上也就转化成了智谋。

如果从价值观念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没有超越外在的价值观念，王道理想的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就在于现实社会。通俗一点说，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实现了多少现实功业，就是实现了多少人生的价值。由于儒家个人的价值定位在现实的世俗功利之中，所以，无论儒家怎样高唱道德的神圣和超越，它最终还是把这些道德神圣还原为世俗的现实功利，而这些道德神圣和现实功利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们所向往的都是利，在形态上的区别则是大利和小利。由于大、小利益的悬殊太大，人们往往看不到道德的功利色彩，往往把它误认为是超功利的。

如此一来，儒家所着重强调的义利之辨，实际上就变成了道德的神圣和现实利害如何转化的问题，而处理这一转化，儒家比其他各个学派更高明，更具有合理性。

这种高明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强迫人们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

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并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儒家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智谋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仁术，仁术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术的核心当然在于以仁治国治民，但如何才能实现治国治民呢？法家和兵家用强力来压服人心，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儒家则主张用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影响别人，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改变整个社会。二者的出发点和走向都恰恰相反。这样，儒家就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当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在这里，儒家为人描绘了一幅无比诱人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一切外在的束缚统统被取消了，只有人的内在世界才是真实的，只要肯加强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确，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在具体的治国治民的策略上，儒家首先讲究的是使人心服。下面引述几段先贤的话，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使人心服的具体方法是很多的，儒家在运作这种智谋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很完备的理论系统和实践经验，在这里无法一一尽述。总的说来，官吏要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为大局着想，为道义着想，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舍己为人，直至牺牲个人的生命。

在后来的儒学大师中，有许多人在为帝王出谋划策时直言不讳地大谈儒家思想对治国、牧民、驯臣、王天下的重大利害。虽然他们已经明确地把儒学当做智谋来对待了，但其中一以贯之的合理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就是在今天，这种智谋也不是完全过时的。

儒家智谋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大智谋实在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看到这些，那种对智谋就是欺诈、就是阴险、就是卑鄙的庸俗理解应该有所改变吧？！

第一章 修身明己 以德为本

社 鼠

有一次,景公问晏子:“治理国家担心的是什么?”晏子回答:“治理国家最担心的就是‘社鼠’。”景公问:“为什么这样说?”晏子答道:“社是供奉土地神的场所,它用木头扎起来做内架,外面抹上泥巴制成,老鼠趁机寄居其中。如果想把老鼠清除出来,那是十分麻烦的。如果用烟熏,怕烧坏了里面的木头,用水灌,又怕损坏了外面的涂饰。这样的老鼠是无法杀死的,就是因为有土地庙庇护。国家也有这种事,国王身边的近臣就是这样的老鼠,他们在内混淆视听,蒙蔽君主,在外卖弄权势,欺压百姓。不除掉他们就会乱了国家的法纪,要除去吧,他们又受到君王的保护,被视为亲信心腹。这样的人就是国家的‘社鼠’。”

晏婴又说:“我听说,有个卖酒的人,他盛酒的器皿都擦拭得特别干净,酒店的幌子高大醒目,可酒放酸了也没人来买。他问邻居是什么缘故,邻人告诉他说:‘你们的狗太凶恶了,客人拿着酒瓶要进屋买酒,恶狗就扑上来撕咬,把人都吓跑了,所以您的酒放酸了也没人买。’国家也有这样的恶狗,就是在君王身边执政当权的小人。一些有道德有学问的贤良之士想为君主效力,这些小人就冲上前来‘咬’他们,讲他们的坏话,这就是国家的恶狗。君王身边的近臣是‘社鼠’,执政当权的小人是‘恶狗’,君王怎能不被障蔽、蒙骗,国家又怎么能没有忧患呢?”

见《晏子春秋》

太子忽辞婚

公元前 706 年，北边的戎人攻打齐国，齐国派人到郑国求援。郑国派太子忽率军救援齐国。太子忽来到齐地，把北戎军队打得不败，并俘虏了两个戎军主帅，还杀死戎军兵士三百多人。齐国的国君很感谢郑国的支援。

起初，在鲁桓公向齐国求婚前，齐侯曾想把文姜嫁给太子忽，太子忽婉言谢绝了。有人问他：“齐国是大国，文姜又是美女，您为什么要推辞呢？”太子忽说：“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关键在于配偶要适合自己。正因为齐国强大，姜氏美，我这才推辞的。如果我接受了，人家会说我不是求妻子，而是想通过妻子来保护自己。人们常说：‘依靠自己，福德无限。’我立身靠我自己，靠大国干什么？”

太子忽打败了戎军，解除了齐国的危难，齐侯又想把别的女子嫁给他。不料太子忽又一次推辞了。别人问他为什么，太子忽说：“当初我并未对齐国做什么事，尚且不敢娶其国女为妻。现在，我只是受了我国国君的命令，率军解救了齐国的危难。如果我因此娶了齐女为妻，这势必会给人一个印象，认为我是借战争之机而娶妻。我回去以后，百姓们将会怎么评价我呢？”

见《左传》

贤内助

晏婴字平仲，夷维人，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国相。他节俭谦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处理朝政，多谋善断，正直无忌；政令简明，百姓易行；连仕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使得齐国名显诸侯。

晏婴身为齐国宰相，公务繁忙，常出使各国。每次外出，为了显示齐国的威风，仪仗隆重，侍从众多，驷马高盖，威风凛凛。然而，晏婴本人却总是显出十分谦恭的样子。

晏婴的车夫，坐在高高的车盖下面，趾高气扬，扬鞭策马，甚为得意。他不仅在外边这样，就是回家后，也还是骄矜自得，旁若无人。他的妻子见他见识短浅，不知进取，想催他上进，就多次与他争辩，他却不以为然。其妻常于门缝中，窥其外出御车的姿态，见其仍旧意气满腹，骄横无比，就非常生气。待他归来后，其妻跪拜说：“贱妾不才，不能伺候贵人，请您让我走罢。”车夫听了，惊异不已，询问道：“我身为相御，进出威风无比，你何出此言？”其妻答道：“晏婴身材短小，不足六尺；外表平庸，容貌若愚；却能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妾观其出，总是那么谦和自恭，显得抱负深远。如今夫君身高八尺，体魄雄伟，却为人仆役，为人驾车，还不图进取，反而得意扬扬，自以为满足，我因此请求离开您。”

车夫听了妻子的这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羞愧不已。从此以后，每逢驾车外出，他总是竭力克制自己，谦和待人，以彰晏婴之德。时间久了，晏婴颇感奇异，就询问其中的缘故，车夫便以实相告。晏婴见其妻出言不俗，御者也还算有志向，便举荐他做了齐国的大夫。

见《史记》

仁者无敌

齐桓公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他听说管仲贤能，就设法从鲁国的手里骗走了管仲，任用管仲为国相。鲁君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污辱，就厉兵秣马，准备同齐国干一仗，出出这口窝囊气。齐桓公听说后，也积极准备，并想先发制人。管仲认为齐桓公刚

刚即位，国内人心未稳，不宜打仗。但桓公正想出出风头，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压服人心。如果按照管仲的想法，先把国内的政治、军事一步步地按部就班地准备好，还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桓公可没有这个耐心。于是，他派鲍叔牙为大将，带兵一直挺进到鲁国的长勺（今山东曲阜县北）。

鲁庄公十分气愤，决心同齐国决个胜负。

公元前 684 年，齐国派大军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率军迎战。一个叫曹刿的人听说后，便入宫进见鲁庄公，问鲁庄公根据什么决定与齐国作战。鲁庄公说：“我有好衣服好食品，从不敢独自享受，一定要分给周围的人。”曹刿说：“您这是小恩小惠。小恩小惠是不能使全国人得到好处的，所以百姓不会跟从您。”鲁庄公又说：“我在祭祀神灵的时候非常虔诚，祭祀所用的牲畜物品从不敢随便增加，祭祀时所祷告之词全都是真实情感。”曹刿说：“您这是一己之诚，并不能代表一切，神灵也不会佑庇您。”

鲁庄公想了想，又说：“还有一点，对于国内所发生的大小案件，我虽不能一一洞察清楚，但是，只要经我处理，我一定要使其审判结果合情合理。”

曹刿赞许道：“这才是打胜仗靠得住的前题。因为您这样做，表达了一种为百姓尽力的心意，凭这点，可以与齐国打一仗。我请求让我和您一同前往。”

鲁庄公答应了。曹刿便与鲁庄公同乘一辆战车，来到前线。

齐、鲁两国军队在长勺这个地方摆开阵势，鲁庄公便要击鼓作战。曹刿劝阻道：“还不到时候，等等再说。”这时，齐国军队便开始擂鼓作战。等齐军擂完三遍鼓时，曹刿才说：“是时候了，可以擂鼓迎战。”结果，鲁国军队一鼓作气，将齐军打败。齐军打了败仗，向后撤退。鲁庄公准备下令追击。曹刿说：“请等一下。”说完走下战车，仔细观察齐军的车辙，然后又登上车前的横板极目远望，最后说：“可以追。”这一战，鲁军大获全胜。

战斗结束之后，鲁庄公问曹刿为什么在齐军三鼓之后才击鼓迎战？曹刿说：“作战要靠士兵的勇气。当齐军擂第一遍鼓时，其军勇气正盛，第二遍鼓，其勇气就减弱了，到第三遍鼓时，他们的勇气就没有了。齐军勇气耗尽，而我军勇气正盛，所以会一战而胜。”

鲁庄公又问：“为什么齐军败后，你不让马上追击呢？”

曹刿说：“齐国是个大国，大国作战，难以琢磨。我怕他们退中有诈，设下埋伏。我仔细看过他们撤退时的车辙，发现其车辙杂乱不堪。又登高远望他们的旗子，发现其战旗已经倒下。由此断定他们是真的溃败了，所以才下令追击。”

在一定意义上说，仁者无敌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如果不加任何分析地使用，就会变得迂腐不堪，甚至是自取败亡之道。春秋时期的宋襄公就是这样的人。

宋襄公本来想当霸主，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亏得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虽然公子目夷等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了。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和斗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独有妙着，他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了“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而大摇大摆地渡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迂腐至极，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给“仁义”之师丢面子。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伤害他了；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俘虏他了。”

爱护百姓，增加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如果只图虚名，或是迂腐自误，那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还会不战自败。

见《左传》、《史记》

晏婴的先见之明

田氏代齐是十分著名的历史事件。此事虽然有其漫长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但齐景公最后给田氏制造了有利的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淳于人把女儿送给景公作妾，生了儿子取名叫荼。景公非常疼爱他，于是大臣们就商量要废掉长公子阳生而立荼为太子。景公把这件事告诉了晏子。

晏子反对这种做法，说：“这样做可不行。让地位低下的人去

和地位高的竞争，这是国家的大害；放弃年长的公子而立年纪小的为太子，自古以来就是产生祸乱的根源。公子阳生年长，受齐国人的拥戴，请大王不要更换太子。因为人的服饰、地位有明确的等级界限，所以卑下者不能欺侮尊贵的人；立太子有礼制规定，所以庶子不能夺嫡长子的位置。希望大王要用礼义来教育荼，不让他陷入奸邪之人的引诱之中，希望您用仁义来引导他，不让他只注重自己的利益。无论年长的和年少的都要按礼法办事，宗族、嫡庶关系也就能合乎伦理规范了。废长立幼的事情，历来不能教育下人；抬高庶子以压抑嫡子的办法，也不会给所爱的公子带来好处。长幼之间没有等级界限，嫡庶之间不加区别，实际上就是给不轨之徒制造了乘机作乱的祸根，请大王慎重考虑。古代贤明的君王，不是不喜欢纵情享乐，只是他们懂得乐极生悲；他们有的人并不是不想立爱子为储，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违背伦理大义就要带来天下的混乱，因此，他们享乐有所节制，立储也遵守道德伦理。那些用花言巧语来欺骗大王的人，怎么值得您信任呢？

“现在，您采纳奸邪之人的主意，听信乱夫贼子的坏话，废长立幼，我真怕将来会有人利用大王的这个过失为他个人的邪恶用心服务，借废长立少以达到个人的目的。请大王一定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齐景公刚愎自用，没有听信晏婴的话。他死后不久，齐国的大贵族田氏就杀了荼，再立长子阳生。不久，又立了齐简公，最后，田氏杀了简公，自立为王，这就是著名的田氏代齐。晏婴的先见之明，即使在今天想来，也是令人感叹的！

见《晏子春秋》

吴起用兵，在德不在险

吴起治国治兵，不以自然条件和已有的社会条件为决定性的因素，他说：“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用兵之道，以治为胜。”

魏武侯接受他的建议，“内修德政，外治武备，治国不以山川之险”，最终称雄一方。

当时，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公正，颇得将士欢心，便拜吴起为西河（魏郡名，辖境在今陕西北部黄河西岸地区）郡守，把他放在最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上，以抵御秦国和韩国的进犯。魏文侯死后，吴起便侍奉他的儿子武侯。魏武侯刚刚即位，为了解国家的形势，便于当年（前 395 年）来到西河，乘船顺黄河而下，察看地形。在视察途中，武侯见高山大河险要奇伟，十分感慨。他回首对吴起道：“山河环抱，形势险要，这是一道攻不破的天然防线，阻挡着敌人的入侵，这真是魏国的国宝呀！”

吴起听了，觉得武侯不懂定国安邦之策，便摇了摇头，说：“国家的兴盛衰败，在德不在险。”武侯见吴起不同意自己观点，便问道：“这是为什么呢？”吴起便援引历史上不以德治国，不施恩德于民，尽管国家的山川地势险要，终遭失败的实例，对他说：“国家的兴盛衰败，在于是否施德于民，不能只依赖山川的险要。从前，三苗氏所居之地，左有洞庭湖，右有鄱阳湖，所处地势险要，由于疏于国家的治理，没有德行，不讲信义，被夏禹灭亡了。夏朝末代君主桀的所在地，左有黄河、济水，右有泰山、华山，南有龙门山，北有太行山，地势也很险要，由于不施仁政，商汤放逐了他。商朝末代纣王的国都，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北有恒山，南有黄河，同样因政治腐败，不行德政，被周武王杀死。如此看来，治国在于有好的政策法令，给人民以恩德，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如果您不施德政，恐怕连您乘坐的船上的人都会成为

您的敌人。”武侯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敬佩地说：“你说得很对。”

吴起辅佐文侯和武侯，镇守西河 27 年，西却强秦，北灭中山，南败荆楚，屡建奇功，拓地千里。魏国强大起来，吴起也因此而名扬诸侯。

众所周知，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也曾被法家认为是善于变法的代表人物，但他更重视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思想，并卓有建树。只因后来不得志，才来到了楚国，在楚国实行了有名的吴起变法。如果细心地考察吴起的变法实践，就可以看出，他与韩非等法家所提倡的思想很不相同，他所希望的是通过抑制贵族的势力，消除国家的腐败，使国家振兴富强，而这些倒十分接近儒家的思想。

见《史记》

踊贵而履贱

齐景公（前 547～前 490）在位时，曾经多次向晏婴赠金，并且试图用多种理由说服他接受，但都被晏婴一一拒绝。晏婴衣着简朴，住宅简陋。齐景公知道后，觉得过意不去，打算更换晏子的住宅，便对晏子说：“您的住宅靠近集市，不仅声音嘈杂，尘土飞扬，而且地势低洼，狭窄潮湿，实在不能居住，请您搬到宽敞明亮、干燥宜人的地方去住。”晏子拒绝说：“我住在这所房屋里，已经觉得很奢侈了，况且齐国的先代贤臣也是居住在这里，我还嫌自己的资格够不上继承这所房屋呢！我住在靠近集市的地方，买东西很方便，怎么敢再麻烦您为我另建房屋呢？”

齐景公见晏婴不肯更换房屋，便跟他开玩笑说：“您的住宅靠近集市，您知道东西的贵贱吗？”晏子回答说：“怎么能不知道呢？”齐景公说：“那么，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呢？”

晏子本来对景公滥用刑罚，致使很多犯人被砍断脚的状况很不满意，知道市场上卖假肢的逐渐增多，此时他灵机一动，想借机进谏，便回答说：“集市上假肢贵，鞋子便宜。”

齐景公听了，脸色变得严肃起来，顿时明白了晏子的用意，从此减轻了对犯人的刑罚。晏婴也受到了百姓的尊重和爱戴。

晏婴不愧是古之良臣，有爱民之心，又有忠君之意，且能不失时机地进谏，使得君主心悦诚服，在不动声色中就“致君尧舜”，实属难能。

见《左传》

以德为宝，以人为宝

春秋时期，子罕在宋国任司城。有一天，一个宋国人得到一块美玉，前来献给子罕。子罕说：“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馈赠，你还是拿回去吧。”

献玉的人说：“您怎么不收呢？我拿这块玉给玉工看过，玉工说这是一块宝物。我把宝物献给您，您为什么推辞呢？”

子罕说：“我已经有宝物了，所以不收。”献玉的人感到十分奇怪，问：“您的宝物是什么？能否给我看看？”

子罕说：“我的宝物就叫不贪。我把不贪婪作为宝物，你把美玉作为宝物，我们各有各的宝物。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美玉，你丧失了你的宝物，我也失掉了我的宝物，是使物各失其所。”

献玉者见硬给不成，便叩头说：“我是个平民百姓，拿着这样的好东西一定会被强盗图财害命。我把它献给您，是为了免自己一死。”

子罕对他说：“这好办，我替你处理。”便接过宝玉，送到自己的乡里，让玉工进行加工雕琢，然后把玉卖掉将钱交给献玉者，让他回家。

子罕辞玉,以德为宝,历来为人所称道,而齐王以人为宝,也名垂青史。

战国时,魏王曾向齐威王夸耀自己国家的宝贝,说:“我国有直径一寸的宝珠十枚,其珠光可照见车前后各十二乘远的地方。”齐威王说:“我也有宝贝,只是与你的不同。我有一名叫檀子的臣下,我派他守南城,楚人就不敢进犯。我有一个叫盼子的臣下,我令他守高唐,则赵国不敢东至黄河。我有一个叫黔夫的部下,我派他守徐州,则有七千余家徙入徐州依附他。我有一个叫种首的臣下,我让他捕盗贼,则齐国道不拾遗。这些人都是光照千里,岂止十二乘车!”

魏王听了,十分羞愧。

见《左传》

万石君修、齐、治、平

河内温县人石奋,在汉高祖刘邦时为中涓。后来徙居长安,历事数朝,官至太子太傅。石奋有子四人,即建、甲、乙、庆,汉景帝时,皆官至二千石,因此,皇上赐号为万石君。

石奋为官谨慎,至年老归家,仍食上大夫俸禄。每到年节,他必定入朝庆贺,守礼如前,就是平日外出,路过宫门,也都要下车步行而过。

石奋是一个忠诚笃实的人,不仅忠于职守,而且家规也非常严肃。子孙们外出为吏,归家时石奋必穿朝服相见。子孙如有过失,石奋从不明责,只是居于侧室,不饮不食,直到子孙肉袒谢罪,才饮食如常。因此石家以孝闻名全郡。汉武帝在建元二年(前 139 年),因感于石奋忠孝治家,特拜石建为郎中令,石庆为内史。这时,儿子石建已经年老,须发皆白,但石奋尚强健无恙。每到五日休沐,石建必回家省亲。到家后,在各室将老父衣物找